

ZHONGGUO
XIANDAI
YUYANXUESHI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修订本)

何九盈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书曾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并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修订本)

何九盈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 一修订本. 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422-5

I. 中… II. 何… III. 汉语史—现代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7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ÖNGGUÓ XIÀNDÀI YǔYÁN XUÉSHǐ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修 订 本)

何九盈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5422-5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5%

印数 4 000 册

定价:47.00 元

题所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①怀禅师颇有点后现代派的意味，将历史视为碎片，一切价值归零。

然而，雁果无意，为何遗踪？水如无心，因何留影？

遥望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天空，雁群在不停地飞呀飞，一队又一队，一批又一批。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头雁——马建忠、章太炎、赵元任、王力，一一飞过去了，飞向了历史的远空，而他们的身影却在学术的长河中留了下来。

东洋那位画坛巨匠说：“鸟儿只觉得光阴在匆匆忙忙中逝去了。然而，它们不知道时间是无限的，永恒的，逝去的只是鸟儿自己。”（东山魁夷《听泉》）

中国的古圣贤并不这么悲观。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论语·子罕》）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

“人”是不会“亡”的，“斯文”也是不会“丧”的。东坡先生说：“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

^① 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全宋笔记》第二编（九）329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

之，存乎其人。^①”

像大江大河一样的出版机构为那些在学术天空疾飞的人们留下了不朽的书影。

把书影集合起来。以类聚，以群分，权衡轻重，品评得失，为之树碑立传，让来者“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感谢商务这条学术大河，也感谢本书的责编乔永先生！

人像鸟儿一样“逝去”，影在出版后流传。

我已经老了，我还在飞。飞是我的天性，影是我存在的见证。

茫茫学海，有谁体验过飞越的艰辛、困苦、迷茫？

我经常提问自己：“月明寒水影何在？雪满梁园几时归？”

心灵的流水告诉我：你要不断飞越，飞越寂寞沙洲，飞越压城黑云，飞越美雨欧风。直到有一天，你再也飞不动了，与“影”依依惜别。

到那时，我会轻轻地低唱：“水流万折心无竞，月落千山影自孤。”^②

我会向照耀过我的日月星辰、哺育过我的山河大地致以永恒的谢意！

（作者 何九盈）

丁亥寒冬于京郊抱冰庐

①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苏轼文集》787页，岳麓书社，2000年。

②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上），189页，中华书局，1983年。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语文运动	15
概况	15
第一节 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	17
第二节 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	34
第三节 汉语拼音化的发展过程	47
第四节 普通语言学的兴起	71
第二章 语法学	84
概况	84
第五节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91
第六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125
第七节 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158
第八节 文法革新问题	192
第九节 汉语语法理论研究	216
第十节 文言虚字工具书	259
第三章 音韵学	263
概况	263

2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第十一节	上古音研究	270
第十二节	中古音研究	344
第十三节	北音学的建立	407
第十四节	“国音学”和北京音系研究	427
第十五节	等韵源流的研究	438
第十六节	音韵学史与概论性的著作	456
第四章	方言学	462
概况		462
第十七节	方言分区	469
第十八节	方言考古	474
第十九节	方言调查	489
第五章	汉字学	509
概况		509
第二十节	古文字研究	515
第二十一节	《说文》研究	525
第二十二节	汉字改革	551
第二十三节	文字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	557
第六章	训诂学与辞书编纂	566
概况		566
第二十四节	训诂理论的建立	568
第二十五节	词源研究	574
第二十六节	经籍旧音考辨	606
第二十七节	古辞书研究	612
第二十八节	辞书编纂	619
第二十九节	训诂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	631

第七章 修辞学.....	637
概况.....	637
第三十节 修辞理论研究.....	640
第三十一节 修辞格研究.....	651
第八章 非汉语语言文字学.....	656
概况.....	656
第三十二节 中国境内语言的谱系分类.....	659
第三十三节 非汉语语言调查.....	667
第三十四节 非汉语文字研究.....	686
第三十五节 非汉语古语言考证.....	708
全书结语.....	721
后记.....	730
跋.....	732
人名索引.....	735
参考文献.....	749
重印后记.....	757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	
——修订本后序.....	758

绪 论

中国语言学史是属于学术史性质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渊源、流派,探索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历史上产生的语言学著作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从而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人起来进行总结。总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理论概括,一种是历史评价。学术史的研究就属于后一种性质的总结。这种总结之所以必要,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学术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认识史,是一部通过学术实践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中国语言学史就是中国历代语言学家对中国境内的语言(主要是汉语)不断加深认识的发展历史。这种认识跟一般认识规律一样,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为了促使这种认识运动向更高级、更深入的阶段转化,我们就要自觉地对前人的学术实践及其认识路线,乃至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加以总结。其实,凡是有突出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们都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的历史状况进行过清算,并在清算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实践路线、方向、方法。这种“清算”就是一种

认识活动。

第二,学术史也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学术研究当然要立足于现实,要面向未来,但学术传统不能割断。不仅不能割断,而且要继承和发扬那些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成果、学术风气。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①。”贯通古今,贯通历史与现实,是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尤其重要。学术史的责任就是要实现这种“贯通”,为愿意“博古通今”的人设一方便之门。

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为了实际需要。“正如人们所说死历史通过生活的活动而复苏,过去的通过当代而成为当代的。”^②“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③

第三,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学术主张、观点、体系、方法,往往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传统观念、传统学风进行挑战的产物。但是,它本身往往又是不完善的,甚至于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正确与错误纠缠在一起。它的必然的命运就是招来无止无休的批评,而批评者的学术修养、文化素质并不一定比被批评者高明。这种学术是非,只能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让学术史来作结论了。这种“结论”也可能不是个别人或个别著作单独作出来的,而是由于文化背景的改变,由于学术观念的更新,人们找到了重新评价的正确标准。

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种学术观点,或者一部学术著作,它自身虽有一定价值,但由于舆论界的过分赞扬,也可以造成“轰动效应”,“受到一致好评”。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所以,同一时代的人评价同一时代的学术著作,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是思想、语言一般不会有障碍,比较容易把握对方的观点、方法。弊的方面主要是存在共同的时代局限,加之感情作用、不健康的个人意识,尤其是恶性炒作,互相标榜,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当然,后人为前人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写历史,也会出现各色各样的问题。为了尽量少出偏差,我以为应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点。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学术上的功过是非。

第二,学术观点的对立矛盾,不统一,有争议,这是正常现象,是学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学术史不应该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调和矛盾,更不应该无原则地抑此扬彼,党同伐异,偏主一家之言。黄宗羲写学术史有一条原则:“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论,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①可见,他是很看重矛盾对立的,不赞同用一把尺子,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复杂的学术分歧。

第三,全面占有材料,直接研究原始材料,绝忌人云亦云,断章取义。据说,西方治学严谨的学者有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绝对不引证自己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一本书。”(孟留喜《引证小议》。《北京晚报》1987年8月11日)这种精神也就是强调要全面地、系统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历史著作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尽量用原始材料说话。作为学术史,也应该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引证,万不可用空洞的议论来代替原始材料的分析。

以上所谈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学术史得以产生的原因和研究

学术史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还处在“开步走”的阶段,我们弄清这些一般道理就很有必要。

“中国语言学史”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主张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研究。第一个大阶段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二个大阶段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对“现代语言学”这个名称,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现代语言学和西方所说的现代语言学,在时代上大体差不多,而内涵不完全一样。

西方现代语言学是跟传统语法学和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对而言的。它的根本特点是由纵向研究过渡到横向研究,也就是由历史的研究转变为平面的研究。提出这种新理论体系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7—1913)成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当我们说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时候,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现代的语言学,二是指语言学的现代化。

“现代的语言学”是对古代的语言学而言的,强调的重点是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而“语言学的现代化”指的是观点、方法的转变,指的是学科本身的革新。从总趋势而言,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语言学逐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但是,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泰西的“葛郎玛”(grammar),历史比较法,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所以,中国现代语言学家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如填补各项空白,搜集、整理语言资料,发展应用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改造,等等。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为止,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之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有了一个比较像样但又并不十分坚实的基础。

具体来说,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科学化、社会化、理论化。

所谓科学化就是明确了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彻底摆脱了经学习气;明确了语言有一个独特的系统,它不仅有音、有义,而且有自己的结构规律,那种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的观念不再有什么影响了;根据语言内部系统的不同产生了明确的专业分工,这种专业分工有益于语言学内部各个分支的建立,有益于这些学科分支的发展,至于有人成为分工的奴隶,陷入片面化的泥坑,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

社会化的内容是双向的。一方面语言学要为社会服务,要走向社会调查语言,要为社会制定语言政策、文字政策;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又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中国语言学不再只是面向书本,不再只是面向古代,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自生自灭的一门学问,也不再是少数语言爱好者从个人兴趣出发所从事的个人事业。中国语言学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营造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语文学会之发起与成立》,见《国文月刊》55期,1947年)民国时代,官方也成立了语言文字的专门研究机构,许多高等学校开设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课程,个别大学还创办了语言学系,现代语言学家差不多都是大学教师或语言文字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这门学科在半个世纪之内就有如此长足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给语言文字学提出

了新的任务是密切相关的。

比起古代语言学来,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传播介绍西方语言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与科学化、社会化相比,与西方语言学相比,理论化的程度还很差。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⑤。”中国的语言学至今未能登上最高峰,与理论思维的缺乏有直接关系。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大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孔老夫子不算,因为他是古人),登上了最高峰。还是恩格斯说得对:“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⑥。”我们的“历史”如何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切是非“折中于夫子”,极端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实践,各门学科缺乏起码的材料准备,哪来的理论思维呢!就语言学科而言,过去没有像样的理论体系,现在也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思维的风气,中国人想在语言理论阵地上真正登上“最高峰”,恐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践吧,理论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中国语言学为什么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兴起的原因,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密切关系。这种变革的深远意义可能我们现在还认识得不透。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社会变革所造成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上的质变,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可与之媲美。仅仅“科学”、“民主”这一对概念的输入,就如同石破天惊,为新世纪的新文化理

下了不朽的奠基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从此无可奈何地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性的句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封建制度的极端腐朽和传统文化的落后面,逐渐暴露于世。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冷眼向洋看世界”。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⑦,80年代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⑧,1898年发生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1905年废科举,1919年“五四”狂飙从天落,封建文化受到摧毁性的打击。今天看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显然相当片面,但从解放思想,批判以经学为主体的旧文化的角度来说,意义不可低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批又一批留日、留欧、留美的青年学生,是批判旧传统、旧文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开路先锋。“五四”前后,“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国语言学家,马建忠、章炳麟、王国维、杨树达、陈望道、黎锦熙、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魏建功、吕叔湘、高名凯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中国现代语言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第一本奠基之作,它的第一批大师,就与西方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称清末到解放以前为“西学东渐时期”,认为“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⑩。这样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实际。

由于1949年以前的语言学一直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于是有人误以为现代语言学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并认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我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中西两种文化相碰撞

的产物。传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相碰撞,总免不了要出些偏差。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蔑视传统,根据西洋语言学的标准苛求古人,贬斥传统语言学;但也有人站在守旧的立场上,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⑩”,讥讽新派“务为夸诞,怪旧艺而善野言^⑪”。这两种偏向,都不是主流,而且也是难以避免的。何止是语言学界,当时的整个文化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林语堂说:“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的文物,又求保守……保守自信与见贤思齐两种心理,都未可厚非。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两者相去,间不容发,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骛奇,彼此之间,岂易鉴别?”^⑫

冯友兰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现代哲学》一文中也探讨过中西文化相遇的规律。他说:“他必须把面临的新文化和固有的旧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并不是相互不理解的,而是相互理解的。二者在相互理解的同时,也还有所批评。在用旧文化来理解新文化,或者用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不能不根据旧文化来批评新文化,有时又不能不根据新文化来批评旧文化。这种情况是东西文化在中国相遇的自然产物^⑬。”

关于语言学领域里的中西结合问题,前辈论述颇多,这里只引用吕叔湘、邢公畹的看法。

吕叔湘说:“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 19 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

法学的影晌。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跟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⑧。”

邢公畹说:“先进的西方语言科学能够‘移植’进来(不是生搬硬套),说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具有可以接受这些先进理论的‘内因’。换句话说,先进的西方语言理论只有跟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语言科学的中国方面^⑨。”

我以为还有一点应该明确,所谓中国传统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二者是有区别的。前一个“传统”是着眼于时间,着眼于历史分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清朝末年已经走向终结。而当我们讲中国语言学的传统时,这个“传统”是指古代语言学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有深远影响的内在要素,包括古人创造的优秀成果、重要结论、良好学风,等等。这个“传统”不仅不能丢,而且现代语言学家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手段、工具、概念,对历史上的优秀成果进行解释、评价、利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为今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建忠、章炳麟、黄侃、钱玄同、杨树达、赵元任、黎锦熙、李方桂、罗常培、王力、魏建功等人在继承发扬传统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仅看不出有什么“鸿沟”,反而觉得他们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这是从主导方面来说的。“典范”也会有缺点、错误,请不要要求全责备。何况,当我们谈论前人的某种“错误”时,还应该想想,这种“错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对学术发展是否有过积